

## ★ 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打击日伪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38年底,八路军由成立时的近4.6万人发展到15.6万人。但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部队中新战士、新干部、新党员的成分大量增加,加上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未能及时进行教育和训练,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与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难以适应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等不良倾向也有所滋长。为此,在全军开展整训工作成为迫切之事。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提出“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的任务。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11日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规定整军利用战斗间隙分期进行,第一期从3月1日开始,为期3个月,整训31个团约10万人。训令要求各部队在整训时要按八路军改编时的编制表充实编制,团属步兵连可逐渐补充,增加1个工兵连、1个侦察连,全团武器应配足,并制订出具体整训计划。5月,八路军总部颁发新的编制表草案。

新四军的整训工作也在开展。2月7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安徽泾县云岭召开有军直、各支队军政负责干部和部分团职政工干部,以及军政治部机关干部百余人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在会上作了《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着重研究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巩固部队、团结友军、瓦解敌军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会议讨论,制订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7月16日,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召开,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6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二期整军训令,指出:要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技术与战术,克服游击主义,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训令规定,第二期整训从7月20日开始,仍为3个月,整训30个团,约10万人,并着重于新组成的部队。

为进一步加强新组建部队的整顿和建设,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主力兵团应组织考察团、巡视团等到新部队帮助工作,协同其军事、政治机关,制订整训计划,并传授经验。

在整训过程中,我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首位。1939年6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指出:两年来部队因忙于扩充发展,党内教育一般缺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因此,决定于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举行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训令并就教育的目的、各级政治部的责任、教育的内容等,作了明确规定,以提高军队中党组织的质量。

7月10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党的工作的训令》中强调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强党内教育;要求各部队力求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纪律,发挥党的组织领导作用。

为此,各部队根据训令,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以及党员标准及修养教育。同时,健全了党日制度,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部队建设和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此外,要求各部队还应注意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其核心堡垒作用。同时,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提高部队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

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各部队在团以上干部中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程,营以下干部学习通俗的政治教材并开设文化课。有的部队还建立了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

与此同时,各部队认真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向广大干部战士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要求我军必须紧密地团结和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才能粉碎日军的残酷进攻;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的倾向作出坚决斗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还建立、健全了秘书、组织、宣传、青年、文化和政工等工作组织和制度,使得整训工

## 抗战时期我军一次重要整训

■ 李林

作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

三

9月30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的训令》,指出:为保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纠正某些坏的习惯和停滞现象,以求得新的进步,政治工作必须提出新的进步口号,反对例行行事、不求进步的观念;必须加强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政工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必须加强政治工作的集体领导与集体讨论,并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10月25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发表《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一文,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行系统论述,并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纠正和克服的方法,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

在整训中,各部队也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军事训练,包括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5大技术和单兵战斗动作、班、排、连攻防战术,以及近战、夜战、伏击、围点打援等。各级政工干部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掀起了练兵热潮。同时,各部队强调学习八路军传统的优良战法,组织干部听课和进行野外演习,加强干部的技术战术水平。在每项操课之前,利用课外时间,由连长召集排长、班长研究如何指挥、纠正动作中的毛病、维持纪律等,先把干部教会,然后再去教战士。

1940年7月下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召开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议,开展以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为主要内容的反不良倾向斗争。8月上旬,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召开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军政干部大会,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扩大部队和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问题。

司令部机关是军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司令部建设,八路军总部于12月8日发出《关于健全司令部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指出:吸收新的参谋干部,健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并要求各部队必须像重视政治工作一样来健全各级司令部机关的组织工作。各部队对司令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检查,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改进司令部与政治机关、后勤等各部门的工作关系,在工作中尽量争取其他部门的支持与协助。

经过1939-1940年的整训,我军全面加强了军政建设,对于战胜敌人、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 “八一”军旗军徽诞生始末

■ 刘征

## ★ 记 史

我军第一面军旗是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打出的。此后,由于红军各部相互协同和联系较少,军旗的样式和尺寸都不统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将设计军旗、军徽问题提上日程。

1948年2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任弼时等研究决定,面向全军征求军旗、军徽样式。

21日,中共中央征求对设计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请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送中央审议。电文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渐感觉有此需要。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的,自应宣布一律取消。惟有些部队已自动带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兹特通电,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工委、中后委意见,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臂章的具体意见。为了征求意见,除你们自己研究讨论外,你们可以组织一个专门讨论此项问题的委员会,提出方案供中央选择,以便颁布统一规定,全体遵行。”据此,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设计样式方案的活动,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全军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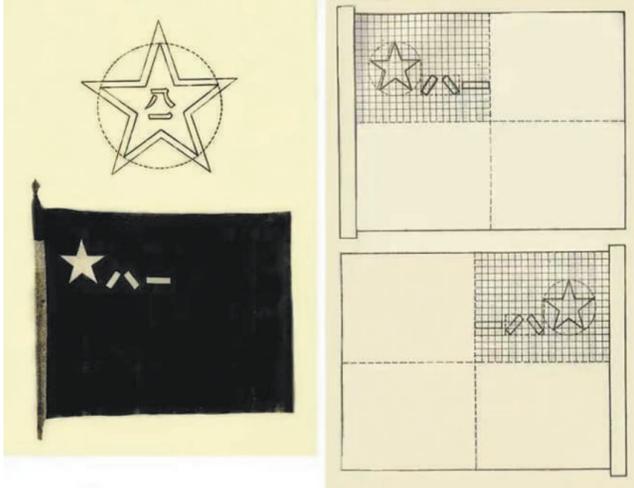
5月,军委作战部调整组织机构,李涛任作战部部长,下设4个局。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和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了军委作战部一局。李涛领受任务后,同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等商议,决定由作战室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负责组织和联络,汇集综合全军的应征方案。

7月,黄镇调任新筹建的军委政治部研究室副主任。考虑到黄镇是美术科班出身,又当过美术教员,懂艺术设计,而且参加红军后,边战斗边创作,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经验,周恩来即指定他一起参与军旗的设计工作。

接到命令后,黄镇随即成立了设计小组,还起草了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通知,用电报发往各大军区和中直、军直机关。

至1948年冬,收集汇总起来的样旗、样徽装了好几箱子。这些样旗、样徽一致选用红色为底色,五角星也成为基本元素。黄镇组织人员将应征图案缩小成统一规格绘成图样,精心制作了30余幅军旗小样,每幅小样下工整地写上设计单位和设计说明,装订成册。周恩来看过小样图册后很满意,建议从中精选出十几种,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审阅。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黄镇又仔细核阅小样和说明,从中精选出12幅,呈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



1949年6月15日,发布军旗、军徽样式命令中的附图。

资料图片

中央领导人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

在此期间,有的部队等不及了,就开始自己动手制作徽章。1948年底,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当看到封面上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时,毛泽东很欣赏,于是便让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份《前卫报》去作战室传达了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以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旗要以红色为底色,既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喜庆颜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不久,周恩来就军旗的设计明确指示: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同时肯定了设计小组提出的军旗尺寸的意见。

黄镇等人按照上述指示对军旗方案进行了调整,其中“八一”字体最初设计为楷体,但考虑到战争中各单位制作该字体有困难,不易规范,故而改成了“齐壮的等线体美术字”。

江右书带着作战部的几个同志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样旗,经李涛把纸样呈送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建议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在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请到会委员们共同审议,提提意见。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作战部制作了两面样旗,一面是五角星右侧为“八一”,置于左上方;一面是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两字放在五角星内。

二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把两面样旗挂在主会场的墙上,各大单位上报的图样也摆放在会场靠墙的几

张桌子上,请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在会议中间休息时审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均感觉挂在墙上的两面样旗比较好,对军旗的尺寸和红底五角星的基本样式表示认可。其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八一”两字在左上方的第一种图案,有的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于是,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虽然《决议》确定了军旗设计的三条原则,但是要拿出元素组合、位置摆放、尺寸比例都尽善尽美的方案,以代表浴血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仍需要花一番心思。3月下旬,周恩来指示江右书等人: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的样旗、样徽。

受领任务后,作战部从各大军区抽调参谋人员,组成工作组。在反复征求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很快便提交了3种设计方案。其中,方案一是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于旗杆一侧的左上方;方案二是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方案三是五角星右侧加“八一”二字,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过之后,军旗样式更倾向第一种方案,军徽样式更侧重第二种方案。

考虑到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项大事,中央领导人交代还应该再征求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并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的意见。同时,委派作战部的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样徽,登门征求各方意见。看过样旗、样徽的人,大都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军旗和第二种方案的军徽。

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张清化等按照第一种方案制作了一幅绸料标准样旗,交由华北军区司令部组织步

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演练授旗仪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苑摄制了授旗仪式演练的纪录影片。影片把授旗仪式上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动作过程拍摄下来,与样旗一并呈中央领导,以待审定。

与此同时,工作组的同志们循着第二个方案的设计思路,又加班加点绘制了新的军徽样式,底色为红色,将“八一”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

军徽样式确定下来后,制作帽徽标准样品的任务就交给了从晋察冀军区作战处抽调到工作组的参谋赵光琛承办。赵光琛根据图纸在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角星周边和“八一”二字镀成银色的帽徽。周恩来和朱德看了电镀的帽徽初样后提出,电镀太亮,在阳光下容易暴露目标。于是,赵光琛又去工厂把电镀改成了黄红两色的珐琅釉。关于帽徽的佩戴方式,周恩来也做出了明确指示,由于战士们平日作战运动量很大,如果用金属丝固定帽徽恐会扎伤战士的头,所以建议替换成棉线,并在五角星的每个角打上小洞用来穿棉线固定帽徽。

帽徽样品通过周恩来审核后,赵光琛又遵照指示征求了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对这一样式非常满意。

三

5月27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审定了“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又在别墅的客厅内审看了授旗仪式的纪录片,决定在6月15日,即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天公布军旗、军徽样式。

6月15日,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同日,新华社就此发表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短评,指出:“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星光照耀着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为长方形,红地,横直为5:4,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故亦称“八一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

根据规定,凡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部队、院校,均授军旗一面。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全军各部队、院校均利用战斗间隙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至1949年末,全军部队官兵的军帽上也基本都戴上了统一样式的帽徽。



本版学术支持:褚银

长征

第6133期

## 全歼日军金井中队的林公渡战斗

■ 江月

## ★ 战 例

1944年8月29日,驻宿迁的日军派出金井中队和伪军侵占了宿、泗运河线上的小张庄,设立据点,控制林公渡口,妄图切断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进而重新控制宿迁至泗阳段大运河。

林公渡北靠运河,西北距宿迁县城32公里,东南距泗阳县城20公里,是苏北与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往来联系的要道。此处地形开阔,易于防御,敌人随即构筑了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50米的据点,在据点四角构筑炮楼,周围还挖有3米宽的一道外壕,外壕后沿筑有暗堡,并架设鹿砦、铁丝网,烧毁了据点外的临近房屋。

在日军进占林公渡前,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兼淮海军分区早已判明敌

之企图,进行了充分准备。一方面,对运河沿线做了详细勘察,绘制地形要图,同时动员群众拆掉院墙,埋藏粮食;另一方面,为了迷惑和麻痹敌人,第10旅有意识地把主力调到沭阳县以南集结,佯装向盐河行动,诱敌向林公渡冒进。

9月5日,第10旅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而拔除之。6日黄昏,我军攻击部队顶着初秋的夜晚,自裴圩、里仁集一线向林公渡奔袭,在7日拂晓前从运河线上崔渡渡河,把小张庄据点团团围困起来。同时,我军构筑工事,挖了数道通往敌据点前沿的交通壕。

7日上午,据点内日伪军发觉情况不妙,组织多次反击,企图冲出包围,均被我军击退。下午,驻宿迁城日军百余人进至洋河镇,企图解林公渡之围,被我打援部队阻击,未敢轻易前进。当晚,攻击部队趁着夜色紧缩对林公渡据

点的包围,逼近前沿。我军从据点西侧发起进攻,用手榴弹炸开鹿砦,冲进外壕,砍断暗堡外铁丝网,向敌暗堡射孔内投入手榴弹将其炸毁,成功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8日下午,我攻击分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正南方向已突破敌前沿,但遭敌暗堡密集火力压制未能进入纵深;东面进攻为敌猛烈火力所阻,多次冲锋未能奏效,敌我形成对峙。晚上,我攻击部队集中炮火,一举摧毁敌人的火力发射点,再次发起冲锋。战至凌晨,敌人已被压缩在东北端三间房屋的指挥所内和东南角两个地堡中。我炮兵集中火力向敌指挥所院内猛烈炮击。激战中,日军金井中队队长被击毙。

余敌惊恐万状,于拂晓前放火烧屋,利用硝烟向西突围,当即被我军歼过半。沿着运河向西狼狽溃逃的敌人,被我军追击到郑楼一带,又遭遇我打援的第4支队,激战中敌大部被歼灭,仅剩